

胡適的1925年——話語權勢的爭奪 與知識分子的時代命運

趙楚均

摘 要

1925年是中國現代政治和思想史的重要轉折年份。當年發生的「批胡反胡」事件，固然有胡適本人思想言行的原因，如與北洋系軍人的合作歷史及對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態度。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化、極端化的學風與世風之下，時人的言行往往會被放置在「帝國主義」／民族獨立、支持「軍閥」／支持革命……等等的一系列二元對立之中，從而將包含胡適在內的一些人劃到革命勢力的對立面。又由於胡適本人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建立的在話語場域的地位，及其具體所為與國、共兩黨的主張背道而馳，因此在革命陣營開始尋求爭奪話語權的突破口之時，自然而然地會在各個場域中——特別是政治性場域——對胡適展開攻擊，尋求撼動其在思想界的地位。終於，思想的競爭被捲入政治場域之中，並且因大局的發展而決出了勝敗；惟此一過程中湧現的「不容忍」的時代氛圍，最終形塑了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的時代命運。

關鍵詞：胡適、國民黨、話語權、學生運動、帝國主義

The Year 1925 of Hu Shih——The Fight for Discursive Power and the Destiny of Intellectuals in that Age

Ye-june Chao *

Abstract

1925 marked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and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The “anti-Hu” incident of that year could surely be attributed to the personal ideas and behaviors of Hu Shih himself, including his past cooperation with the military of Peiyang Militarists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anti-imperialism movement.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was because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ization and extremization in both the academia and the society, people’s words and deeds were examined against a series of binary oppositions such as imperialism vs. national independence, support of the warlords vs. support of the revolution etc., which placed many including Hu Shih to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evolution. Furthermore, considering his status in the discursive field he had achieved sinc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his behaviors that ran counter to the beliefs of bo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CP, it’s natural that when the revolution forces began to seek a breakthrough point to gain the power of discourse, Hu Shih would be attacked in every field, especially the field of politics, so as to challenge his status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Eventually, the rivalry of thoughts was dragged into the field of politics and the result was determined by the macro situation at that time. In this process, with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the age being “intolerant”, the different destinies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age were finally shaped accordingly.

Keywords: Hu Shih, Kuomintang, Discursive Power, Students Movement, Imperialism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Et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胡適的1925年——話語權勢的爭奪 與知識分子的時代命運*

趙堃均**

壹、前言

魯迅在收錄了其11篇短篇小說的集子《彷徨》一書中，題辭感慨：「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據後來的注釋者解析，這是魯迅對於《新青年》群體分裂——特別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胡適從新文化陣營中分出去」——的哀嘆。¹ 魯迅寫下這首詩時想要表達什麼是一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註釋者下的這段註腳。這種對胡適的評價（或謂「醜化」？）方式固有其時代因素，據余英時的說法，這種「醜化胡適的運動早始於1920年代的末期，但大功告成則在抗戰後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代。」² 余英時並未明說「1920年代的末期」具體是哪一年，但據耿雲志在其所編的《胡適年譜》中，1925年

* 本文係西南大學2018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北洋後期的中國國家整合研究」（SWU1809719）的中期成果之一。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西南大學張武軍教授、安徽大學張朝勝先生、肇慶學院嚴智德先生的幫助，同時亦自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中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惟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20年6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9月18日。

** 臺灣大學文學士，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¹ 參見魯迅著，周振甫注，《魯迅詩歌注》（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128。雖然這首小詩作於1930年代，但此處所要引用的是這段引文為周振甫的注釋。

²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頁265。

的條目下有一條：「胡適因沒有參與反對章士釗的宣言，又加此時有所謂『清室復辟文證』被揭載於報……遂掀起一陣批胡反胡的運動。」³或許便是余英時所謂「醜化胡適」的起點，這正是本文的主題。本文研究的對象，與其說是胡適本人，毋寧說是1925年前後圍繞胡適的爭論、其背後所牽涉的政治及文化領導權的爭奪問題，及這些事件所折射出的時代氛圍。

歷史肯定不會只有「醜化」或「美化」，余英時此處的說法可能是因為他對自由主義的信仰，故而傾向於強調胡適被一個反對自由主義的政治組織「醜化」的歷程。但其實，至少在這一過程起點處的1925年，雖然確實在日趨激烈的群眾運動中胡適曾經被「醜化」了；但他之所以被「醜化」，一半是他的思想與言動所招致的，一半則是當時學風、世風及現實政治局勢使然。對於這一複雜的歷史過程，耿雲志只是簡單提了幾句，並沒有詳細的說明。其他幾部影響較大的胡適傳記，對於這一年胡適言行的記載亦相對簡略，如賈祖麟只簡單提了一下五卅慘案之後的胡適並且在政治上為其辯護；⁴白吉庵雖然對事件前後有較詳細的交待，最終結論卻回到「因為他們在反動政府高壓政策下委曲求全……所以胡適在青年學生中成了眾矢之的」的簡單結論上、缺乏深入分析；⁵沈衛威對1925年的胡適只提到其出席善後會議一事；⁶羅志田則將篇幅用來強調此時胡適「向左轉」的思想傾向、而對其具體行動及境遇一筆帶過。⁷扣除以階級鬥爭史觀出發的著作，對1925年左右的胡適有著較為詳細討論的當推汪文麗、邵建和江勇振等3人的研究。

汪文麗在其碩士論文的第二章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描述了當時的「青年」如何「批胡反胡」。汪文麗大篇幅地引用了大量胡適本人文件及其所招來的批評言論，描述胡適對善後會議、五卅慘案、清朝復辟的言行及在武昌的演講等所受

³ 耿雲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42。

⁴ 賈祖麟著，張振玉譯，《胡適之評傳》（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頁185-186。

⁵ 白吉庵，《胡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26。

⁶ 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174。

⁷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51。

到的批評，並且最終指出：「『批胡反胡』事件最根本的原因是日趨激進的民族主義風潮，直接原因是這一大背景下溫和的胡適和激進的青年這兩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訴求上的矛盾。」這樣的矛盾終於使胡適失去了在青年學子心中的文化領導地位。⁸ 這樣的總結，挑明了1925年「批胡反胡」事件對於胡適及思想界的意義。然而，汪文麗的文章仍有未盡之處。如果將文化領導權的爭奪比喻成一場戰役的話，汪文麗雖然在大段引用史料的同時也提及史料創作者的名字，但僅止於列出一串名字而已，對於這些名字的主人究竟是哪一派人馬，則未作任何分析。雖然他在第四章中曾經用半頁的篇幅介紹了他所引用報刊的政治立場，但隨即以「近乎人身攻擊般的批評除了與學生的激烈情緒有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黨對學生的利用，青年學生是『被運動』、『被動員』的」。一語簡單帶過而未再多作分析，將討論的焦點轉移至青年學生的苦悶及其與青年激進化之間的關係。⁹ 總之，汪文麗的文章雖然詳細地敘述了戰爭的經過及後果，但對參戰方面目的描述卻仍然不夠清楚。

邵建對於這場戰役的描述較為詳細，他從歷時性的角度整理了從《胡適日記》和《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所見到的胡適被批判的各種言論，並且總結道：「這樣的語氣、辭彙、句子乃至文風，豈獨出自少年學生（他們其實是有所學的），他們的領路人瞿秋白更是運用嫻熟。」從而暗示這些攻擊胡適的「青年」，其實是「陳獨秀鼓動下的或魯迅感召下的青年」。¹⁰ 這樣的作法，相較於汪文麗而言，描繪出了參戰一方的面目，可以說是一項推進。但這樣的推進仍然不夠，因為邵建雖然點出了攻擊胡適的「青年」是陳獨秀一派的青年（或者可以稱為左翼分子），並且討論了一些左翼分子對胡適言行的觀感，但這些「青年」攻擊胡適為的又是什麼？難道只是思想或政治態度的異同而已嗎？答案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說汪文麗關注的是「批胡反胡」的事件，而邵建關注的是「批胡反胡」

⁸ 汪文麗，〈胡適與1925年的青年「批胡反胡」事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碩士論文，2005年），頁70。

⁹ 汪文麗，〈胡適與1925年的青年「批胡反胡」事件〉，頁55。

¹⁰ 邵建，《胡適前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年），頁315-316。

的參戰者，江勇振則將關注的焦點放到胡適本人之上。在其高達956頁的巨著《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中，江勇振以長達142頁的篇幅詳細描述此時胡適如何與各方周旋、論辯以宣揚自己的主張，同時也追溯胡適言行的思想來源，對於了解胡適本人的思想與行動具有一定的價值。¹¹ 在此章節中，江勇振主要的論辯對象是羅志田——羅氏的主要觀點為此時是胡適一生中最「左」的一個時期，其具體表現是胡適對蘇聯的態度。江勇振同時從胡適的思想及行動兩個層面反駁羅志田的觀點，指出胡適充其量只是接受社會主義「用社會集體，或政府的力量，以求取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理想，而對社會主義者實踐此理想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念：經濟史觀與階級鬥爭的理論」——嗤之以鼻，故而胡適自始至終並未改變其「美國最好——俄國從來就不是選項」的態度。¹² 如果說此時的胡適與其他時候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那反而是此時的胡適「向右轉」，是他一生中民族主義色彩最重的一個時期。江勇振的研究建築於充分的史料基礎之上，同時也對可能影響胡適的同時代思想著作進行了追溯，論據完整，推理清晰，惟其研究是以胡適為主體，胡適主動的思想及行為是其研究的主線，與本文的角度不甚相同——本文雖然也涉及胡適的所思所想，但本文更關注的是當時思想上的交鋒及從中衍生出的話語權勢爭奪問題。

總而言之，我們固然不能否認胡適在這一年受到批判有其「自找」的成分，因此對於胡適本人的言行肯定必須給予一定的關注。但如果沒有將其放在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所討論的時代氛圍及政治事件中，那麼對於胡適的攻擊也許至多只是學術性事件，而非事實上所演變成的政治性事件。打個比方，一件物品之所以會燃燒，除了它自身可燃外，同時也需要有火源及助燃物。1925年前後胡適的思想與行動使得他自身成了「可燃物」，目前學界討論較為相對缺乏的，則是這把火的「火源」及「助燃物」，這也是本文主要的關注點與創新點所在。

¹¹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頁803-942。

¹²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837-838、828。

貳、思想的分歧

胡適在1925年前後做的事情，是使他捲入「批胡反胡」事件的內因。那麼，1925年的胡適，究竟做了什麼，導致「批胡反胡」事件的發生？誠然，前引論著中所提到的反對馮玉祥驅逐宣統皇帝、參加善後會議等事，在某些人眼中，確實可以算作是胡適的「罪狀」。但一來人們對這些事件的關注有限，二來「批胡反胡」的聲浪更多發生於該年的下半年，與上述事件有一定的間隔，所以它應非引起胡適受到攻擊的主因，它只是「批胡反胡」事件發生後反胡勢力的「相罵本」。根據時間上的序列，「批胡反胡」的導火線，應是胡適對五卅慘案及其後續事件的態度。據胡適自述，此時攻擊他的多是陳獨秀的「同黨少年」，¹³ 故而我們首先得追溯胡、陳在此一問題上的異同。

一、胡適的學生運動論

所謂五卅慘案，指的是1925年5月30日，公共租界裡英國捕頭奉命開槍射擊上海一帶的遊行群眾，造成數十人死傷一事。消息一出，全國各界紛紛響應，陸續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怒火。然而，當胡適聽聞到這消息的時候，他並未與其他人一樣立即振臂高呼「反對帝國主義」，反而質問：「何謂負責任？就是將主張的效果先想像出來，考慮一下，然後用這個效果來批評自己的主張。對於自己的主張負責任，就是有負責任的態度。譬如主張宣戰，就要把宣戰的效果想出來是怎樣，……又如主張經濟絕交，這四字的含義究竟怎樣？我們於此熱烈之時並沒有去分析。……又如主張派兵到租界去。看起來調兵是很可能的。但是中國的兵到租界或租界的四圍如像漢口所作的事，是不是與我想派兵去維持治安的意見一致呢？」¹⁴ 這一連串的問句雖然表面上仍較為客氣地希望各方能夠提出「宣戰」、「絕交」、「派兵」等事的具體執行步驟，但其潛臺詞卻是當時的中

¹³ 胡適，〈南行日記〉，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02。

¹⁴ 胡適，〈對於滬漢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25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345-347。

國根本沒有與列強進行對抗的本錢，正如與胡適接近的清華教員張彭春在其日記中所說的：「講武力我們有什麼預備？機械在那裡？科學發明是戰爭利器。人材〔按：才〕在那裡？錢從那裡來？一時組織由那裡入手？什麼是我們精神的獨立，和精神的預備？」¹⁵ 換言之，在這一派知識分子看來，中國沒有與列強進行軍事對抗和經濟對抗的本錢。

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胡適看來，當務之急是用外交——而非戰爭——手段解決問題，國民透過種種和平的示威以為「外交的後援」，藉此爭取「各國人士之了解與同情」、促成「開修改條約的會議」。¹⁶ 事實上，在國力明顯不足的情況下，「修約外交」一直都是北京政府的外交方針。¹⁷ 生活於那個年代的胡適等人也認可這樣的作法，在五卅慘案爆發之後，胡適曾與羅文幹、丁文江乃至北京大學的其他教授們數次發表宣言與公開信，希望能夠引起英美等國相關人士的注意與同情。¹⁸ 胡適甚至表示願意透過個人人脈促成北京學生與英國公使直接對話。¹⁹ 從這些行為可以看出，與當時許多帶有激進民族主義色彩的組織在宣言主張外人「滾出中國」、甚至不惜流血的態度不同，胡適等人希望能夠透過輿論的手段促成「修約外交」，謀求事件和平落幕。

短期內的問題期能透過和平的「修約外交」解決，但胡適同時指出，長期的關鍵還是在於培養中國的國力，而正如前引張彭春所說的，一切的關鍵在於必須要有人才。對於胡適而言也是如此，因為「救國事業更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故而胡適對青年學生高呼：「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吶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也即是「立定腳跟，打定主義，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成個有用的東

¹⁵ 張彭春，《張彭春清華日記（1925）》（臺北：開源書局，2020年），1925年6月3日，頁86-87。

¹⁶ 胡適，〈對於滬漢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25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345-347。

¹⁷ 參見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553-555。

¹⁸ 相關考述參見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861-876。

¹⁹ 〈英公使欲與京學生界談話〉，《大公報》，天津，1925年6月17日，第1張頁3。

西。」²⁰ 這樣的觀點承襲自新文化運動時期「賽先生」一系呼喊，認為要救中國首先得有新式人才；新式人才不可能從街頭中鑄成，只可能從新式教育的課堂中鑄成。因此，青年們首要的任務便是學習，只有掌握了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才是救國的根本之計，若為了上街吶喊而失學便是捨本逐末。²¹

上述觀點是胡適一生一貫的態度，胡適1925年的這些言論，亦是基於對國情的認識及對學生的期許而發，未必有黨派愛憎介乎其間。然而，在陳獨秀等左翼人士看來，「對於政治及政黨不甚關心，這是中國進步遲緩的現象，決不可說是好現象，軍閥政治正是根據這個現象而發生而續價〔按：原文〕存在的。主張『不問政治』、『不要政黨』，此時一定很受人歡迎；然而這種主張越受歡迎，越是中國人的災難。」²² 陳獨秀認為，中國之所以進步遲緩，是因為人們不關心政治，故無法促成進步；而軍閥正是利用人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而得以廣續其統治。換句話說，只有人人關心政治了，軍閥的惡政治才有可能被推翻；如果有誰號召其他人不要關心政治，那他就是在為軍閥的惡政治張目。這樣的指控或許太過簡化，但如果從當時的政象來看，早已不得人心的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確實花了大力氣希望能夠減低青年學子對政治的關心，如時任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在其主辦的《甲寅周刊》轉載了大同學院禁止學生罷課的通告：「學術救國，在實致其功，本校揭櫫斯旨，非謾言也。……茲特重申信約，本校守定宗旨，仍照歷年辦法，孤詣進行，許以奮學救國，決不許以廢學出位救國。人各有志，學校亦有自主政令，有不能遵守此約者，未來者不必來，既去者不必復來。」²³ 如果將作者名字遮住、並將這段文字翻譯成白話文，那麼讀者可能很難分辨這則文字是出自胡適派或是章士釗派學人之手。故而此時的胡適與章士釗儘管因為許多問題而大打筆仗，但對於罷課鬧革命的看法在表面上看來卻是極為相像，而與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左翼人士站到了對立面。

²⁰ 胡適，〈愛國運動與求學〉（1925年9月5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卷，頁822-823。

²¹ 相關討論見潘光哲，〈怎樣歡迎「賽先生」：胡適與巴斯德〉，《思想史》，第6期（2016年3月），頁1-46。

²² 陳獨秀，〈無政府公團主義與黑暗勢力〉，《陳獨秀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60。

²³ 〈胡敦復致《甲寅周刊》函〉，《甲寅周刊》，第1卷第5號（1925年8月15日），頁17。

二、胡適的帝國主義論

無論胡適是否贊成學生運動，學生畢竟還是上街了，並且與「胡適派學人」²⁴發生了劇烈的衝突。1925年7月18日，各團體在北京天安門召開國民大會討論五卅慘案後續交涉事宜，發言者分成急進和穩健兩派，兩派相互在對方發言時鼓噪。當會議主席團成員王世杰（係「胡適派學人」之一）在宣讀其相對「緩進」的單獨對英交涉提案時：

臺下群眾應聲四起，惟持紅旗者對每讀一提案竟即大呼「通不過」。時有三五人登立主席臺左旁之總指揮臺，用傳聲筒大呼「打倒日本」、「打倒賣國賊」、「打倒親日派」等語，並各持手杖指主席臺中人為親日派，臺下持紅旗者亦戟指向主席臺叫罵。適外交當局代表丁文江登臺報告，持紅旗者即大叫「不聽賣國賊的話」等語，一時秩序大亂，丁未得畢詞即退。其時一部分工商界中人睹此現象，憤憤散去，臺下有一學生大聲責持紅旗者為搗亂，詎有三數胸繫徽章之代表即大呼「打賣國賊」，且自臺上一躍而下、追逐該學生，呼「打」之聲忽起，該學生狂奔避之，群眾不明真相，亦隨而蜂湧奔避，一時馬仰人翻，致遺棄冠履者甚多。持紅旗者尾追良久始回。一小時之內，此種醜劇凡三見，因此群眾望之，然而去者益多。然「打倒賣國賊」之呼聲迄未絕，且亦只有此種呼聲。旋主席臺忽高揭小旗兩面，大書「共產黨破壞國民大會」數字，於是「驅逐共產黨」之聲又起。時主席團宣告散會，紛紛散去，而「打倒賣國賊」、「驅逐共產黨」之聲猶未絕，迄群眾散盡始告停止。²⁵

²⁴ 「胡適派學人」為後世史學家所發明之名詞，指的是1920年代初期《新青年》群體分裂後《新青年》右翼和英美留學生所聚集而成的鬆散團體，胡適為該團體的核心。其主要事業是透過刊物傳播其政治和思想文化主張，1922年的《努力週報》是其發軔，其後辦過《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乃至1949年之後的《自由中國》等雜誌。骨幹成員雖然隨著時間推移略有變動，但大體都是自由主義的信仰者。參見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頁70-161。《現代評論》雖然名義上並非胡適所創辦，但包含主編王世杰在內的主要撰稿人多是留學英美的大學教授，在私人關係上與胡適接近，而胡適也時常為此刊物撰稿、以之為陣地宣傳其政治和文化主張。

²⁵ 〈天安門之國民大會〉，《晨報》，北京，1925年7月19日，版4。

由「北京雪恥會、北京學聯、北京國民黨市黨部等團體」構成的「急進派」在被驅逐後也發表宣言，痛批王世杰等人為「政客式的學生」、「不可靠的同胞」，指其所辦的國民大會根本是為了反共，而非反帝國主義，因為這些人「代表的是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利益：處處為英國以外的帝國主義辯護，處處減低要求，處處縮小範圍，處處躲避提及軍閥，處處為段執政、沈總長、三大員捧場」，並且在宣言的最末高呼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同時，亦要「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²⁶

王世杰等人主張對英單獨交涉，或許有基於當時中國實力不足以同時對付多國的考量在內；²⁷ 但如果要追究思想上的原因，很可能與胡適等人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有關。事實上，胡適一直對所謂的「帝國主義」一詞不以為然。對於胡適而言，清末的帝國主義列強到了此時對中國早已不具侵略野心了，正如在1922年年末，列強將要對中國實施「國際共管」的聲浪高漲之時，胡適卻公開表示「共同管理」之說純屬無稽，因為「日俄戰爭以後，因日本的勝利而遠東局面一變；辛亥革命以後，因民族的自覺而遠東局面再變；歐戰結局以後，又因中國民族的自治而遠東局面又經一次大變。老實說，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巴黎的一鬧，華盛頓的再鬧，無論怎樣無結果，已夠使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國是一個自覺的國家了，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大概都曉得那第一條路——征服統治中國——是做不到的了。」²⁸ 正是因為胡適認為當時的中國已經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了，所以認為「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純粹是無的放矢，以至於他在英文著作中對於此時「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翻譯，並非「anti-imperialism」，而是「anti-foreign」（反對外國／排外）。²⁹ 雖然胡適也承認五卅慘案的發生是「總含有一點時代性」的「八十年來的不平等條約」所致，但既然這些條約是

²⁶ 〈北京學生聯合會為十八日國民大會敬告國人〉，《政治生活》，第45期（1925年8月5日），無頁碼。

²⁷ 同時對多國採取敵意行動，不由得令人想起庚子年慈禧太后對多國宣戰、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的往事。當時許多國人對此仍然心有餘悸，致使陳獨秀不得不在1925年前後多次發文為義和團辯護。此中歷史記憶與現實政治的糾纏當大有文章可作。

²⁸ 胡適，〈國際的中國〉（1922年10月1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卷，頁493。

²⁹ 見Hu Shih, "The Present Crisis in Christian Education," (July 1925), 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6卷，頁63。

「時代性」的，那麼「我們提出修改也是極正當的。其他美國也有人主張修改條約。而俄國自然是贊成的了。」³⁰總而言之，因為「沒有帝國主義」了，所以列強對中國領土並無野心，故而可以和列強講道理；在講道理的情況下，既然五卅慘案起因是法律事件，那麼便應從法律的作法著手，其他政治性問題在性質上只是對法律事件的補救及預防而已。

三、「沒有帝國主義」？

如果說街頭上的衝突是非理性的突發事件、可能摻雜了其他思想以外的因素的話，胡適可能沒有料到，在相對平和、理性的朋友聚會場合中，他的帝國主義論仍然引起了爭吵。據汪原放回憶，1925年11月，胡適與陳獨秀有過一次談話：

仲翁道：「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適之兄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司的克來，在地板上連連的篤了幾下，說：「仲甫，你坐吧，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樓出去了。仲翁坐了一會，一句話沒有說，臉上也有幾分氣惱。後來說：「我再來。」也去了。³¹

隔日，汪孟鄒據此質問胡適，胡適竟也一把扯著汪孟鄒的袖子，連連的扯了幾下，說：「孟鄒，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帝國主義？」³²以溫和著稱的胡適有如此激烈的舉動，可能與他當時正受到來自陳獨秀的「同黨少年」的批判有關（詳後）；但從汪原放的記述可以看出，雙方對對方的觀點都覺得極端不可思議甚至不可理喻。相信無論是胡適或陳獨秀，都不會否認當時中國正面臨來自外國的壓迫，但為什麼卻有如此極端的差異？其原因或許有二：

（一）如前所述，胡適所說的帝國主義，是以「征服統治中國」為斷，而1920年代的各國對中國都無實際的攫取領土行為，故他認為已經沒有帝國主義

³⁰ 胡適，〈對於滬漢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25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347。

³¹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北京：學林出版社，2006年），頁97。

³²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頁97。

了。與之相對，陳獨秀的帝國主義論則本諸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論斷，認為國家機器是壟斷財團的工具，財團為了獲取超額利潤，故透過國家的帝國主義行為以開拓海外市場，並與其他國家的同業一同瓜分世界。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雖然並未亡人之國，但卻已成功地將有色人種變成剝削與壓迫的對象。³³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陳獨秀所說的帝國主義並不以攫取領土為斷，更重要的是「協定關稅制，稅則、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權，這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制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為在此關稅制度之下，不得列強之許可，不能自由增加進口稅，以遏外貨之輸入；不得列強之許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稅，以遏原料之輸出；如此產業落後的國家，永遠不易發展，永遠為銷行外貨之市場。」³⁴由於定義不同，自然使得兩人間的討論未能產生交集。在胡適看來，如果問題只在於協定關稅等經濟上的不平等政策，那麼因為它是「總含有一點時代性」的「八十年來的不平等條約」的產物，故可以修約解決，毋需採取激烈行動；而在陳獨秀看來，這些經濟特權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立國的命脈，一旦放棄，根據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將動搖其國本，所以它們萬萬不會讓步，中國人民除了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之外，別無其他出路。

（二）定義上的不同，導致了政治路線的歧異。在上述爭吵發生前一個月，胡適與陳獨秀在上海的亞東圖書館已經有過多次的晤談，其談論的「還是老問題：『問題』與『主義』」。³⁵這段爭論或是上述爭吵的鋪墊。雖然在1919年8月發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主義派」如李大釗等人也承認在立定「主義」之後應研究具體問題，但雙方的關鍵性差異在李大釗認為存在著一個先於一切問題的「問題」，如在俄國的問題上，只要「羅曼諾夫家」、「經濟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一切問題，絲毫不能解決」。³⁶同樣地，對於中國問題，陳

³³ 參見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9、71。

³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冊，頁385。

³⁵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頁97。

³⁶ 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17日），收入朱文通等編，《李大釗全集》，第3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10。

獨秀認為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列強、軍閥、及禮教」，³⁷而列強是其根本，因為列強「對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慣用的政策」是「扶植舊勢力，抑制新勢力，俾永遠在他們支配之下」，故「革命黨若只反對軍閥而不反對帝國主義者，乃是一極大的錯誤觀念。」³⁸換言之，陳獨秀認為，中國人民已經認識到軍閥及禮教之非而想將之革除，但因為帝國主義的力挺，使得軍閥及禮教依然肆虐，所以必須打倒帝國主義，一切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這樣的言論，頗近似於胡適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批判李大釗等人的「『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³⁹從中可以看出，此時胡適與陳獨秀針對「帝國主義」的分歧，除了前述因定義不同而產生的不同認知外，同時也有對救國路線的不同。胡適認為應該本著實驗的態度，針對個別問題尋求其病源及處方，而不是像陳獨秀那樣把一切都歸咎於「帝國主義」，「自以為」打倒此一惡的主義後，革命群眾所信仰的善的主義（無論是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便會接管並解決一切問題。⁴⁰

不同的現實認識，及不同的救國方法，所導致的自然是胡適與陳獨秀在政治行動上的分道揚鑣。由於胡適主張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等，⁴¹一個一個地加以研究，再「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

³⁷ 陳獨秀，〈土耳其放逐教士〉（1924年2月27日），《陳獨秀文集》，第2卷，頁574。

³⁸ 陳獨秀，〈帝國主義者援助軍閥之又一證據〉（1924年7月30日），《陳獨秀文集》，第3卷，頁93。

³⁹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頁328。

⁴⁰ 事實上，胡適並不認為列強是「禮教」的直接或間接捍衛者；相反地，他認為列強是給中國帶來新文明的施惠者。他曾經公開表示：「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裡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參見胡適，〈慈幼的問題〉（1929年），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卷，頁840。因此，他甚至呼籲美國人要「用友好的方式來征服中國」、「你們務必竭盡所能的去完成這個文化征服的大業。」參見Hu Shih, "Address at the Chinese Institute in America", 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6卷，頁201。

⁴¹ 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919年7月20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頁327。

命)」加以解決，如此則「可以縮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數人鼓吹的工具之實施期間……必能得著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會間交互的衝突，而且可促社會全體底進步。」⁴² 因此綜觀胡適的一生，他先是在1922年與吳佩孚合作組建了「好人政府」，1925年的善後會議中也想要「試他一試」。⁴³ 在這種思維慣性之下，即使胡適對段祺瑞執政府並無好感，但因為北京政府尚是當時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故而在許多問題上，包括在五卅慘案後一切相涉問題上，胡適也只能號召做些「我們工商學各界」該做的事，「以為外交的後援」。⁴⁴ 與之相反，陳獨秀等人因為建立了「帝國主義—軍閥政權—惡政治」的連結，故唯一的出路是「以國民主義，對外要求民族的政治經濟之獨立，對內要求人民政治上的自由」，⁴⁵ 除了革命，特別是革北京政府的命以外，別無他途。

正是因為這種思想上的異同，使得胡適與陳獨秀在此一歷史時期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了不同、甚至難以調和的政治隊列之上。政治立場的對立，在這個缺乏有效利益表達平臺的時代裡，終於使思想上的競爭成為政治上的敵對行為。

參、政治的對立

胡適在五卅慘案後多次旗幟鮮明地反對學生罷課鬧革命，並且在「帝國主義」問題上與熱血正沸騰的青年大唱反調，這麼做自然是基於前節所述的思想因素，使得向以對青年「負有指導之責者」⁴⁶ 自命的他，不願坐視「青年犧牲學行訓練之大弊」⁴⁷ 發生。從旁觀者的角度而言，這些應該都只是思想分歧，至多是

⁴² 胡適，〈好政府主義〉（1921年10月22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259-260。

⁴³ 〈胡適日記〉，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0卷，1925年2月1日，頁194。

⁴⁴ 胡適，〈對於滬漢事件的感想〉（1925年6月25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347。

⁴⁵ 陳獨秀，〈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1924年），《陳獨秀文集》，第2卷，頁527。

⁴⁶ 語出胡適，〈劉熙關於「愛國運動與求學」的來信附言〉，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1卷，頁348。

⁴⁷ 此為蔡元培在國民黨北伐勝利後回顧此前數年所策動的種種學生運動的後果時所言。見蔡元培，〈關於青年運動的提案〉（1928年夏），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5卷

「朋友之間的爭論」；⁴⁸而且理論上此時主要的敵人應是英、日等國，至多及於被目為「帝國主義走狗」的段祺瑞政府，批判胡適似乎並無意義。但是，批判卻還是發生了，其直接原因當然是因為胡適自己主動跳到風口浪尖上發出了「不時髦」的言論所致，導致自身成為「可燃物」，但除此之外，其時政治化的學風與兩極化的世風則可以說是「助燃物」。

一、政治化學風中的胡適

如果說1925年的許多政治性事件都是以學生運動／運動學生的形式展現的話，那麼便有必要分析政治立場與學生運動之間的關係。正如時任上海滬江大學國文學系主任朱經農的觀察，當時「官立學校多半烏烟瘴氣，不為此派所把持，即為他派所占有。」⁴⁹朱經農雖然沒有明說這些派別是依據什麼而組成的，但這樣的描述依然可以反應當時學校已經成為一個政治化的場域——無論此處的「政治」指的是國家大政方針或是「學閥」之間的朋黨式行動。這種現象遠非始於今日，早在1923年，已有論者指出當時「施教育的人（1）把教育界底位置當成官場底差缺支配，（2）用政客辦黨的方法和手腕去對待學生」；⁵⁰同時亦有人指執掌北京大學的蔡元培、胡適等人是「學閥」云云。⁵¹無論這種現象的成因是什麼，部分文化精英透過掌控學校以對學生發揮影響力，從而將學校轉化成為個人的政治資本，至少在1920年代初期已成為眾目所睹的現象。

「學閥」與學潮的關係在1925年發生在北京城內的兩起較大的教育界事件——女師大風潮、北大獨立事件——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女師大風潮的起因據說是「因為以國民黨元老、北京大學教授兼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中

（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65。

⁴⁸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編，《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18。

⁴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22。

⁵⁰ 止水，〈要怎麼樣整頓學風〉，《晨報》，北京，1923年1月11日，版2。

⁵¹ 如王恆，〈論學閥〉，《順天時報》，北京，1922年10月29-31日，版4。王恆是國民黨籍的眾議院議員，蔡元培對其攻擊耿耿於懷，事後猶在日記中提及此事。參見〈蔡元培日記〉，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16卷，1923年3月7日，頁210。

法大學代理校長李石曾為首的法日派，想讓另一位國民黨高層人士易培基取代楊蔭榆的校長職位」，⁵² 故而利用學生對校長楊蔭榆的不滿所引起的。在這起風潮中，教育總長章士釗選擇站在楊蔭榆一方，除了同意其封校、開除部分學生的舉措外，同時亦以教育部令的形式指控在學潮中表現活躍的「本部僉事周樹人〔按：魯迅〕，原係社會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職責均極重要，乃於本部執行令准停辦該校，正屬行政嚴重之時，竟敢勾結該校教員、搗亂分子及少數不良學生，繆〔謬〕托校務維持會名義，妄有主張，公然與所服務之官署悍然立於反抗地位」，⁵³ 並將之開除。在這場紛爭之中，胡適本人雖未公開發言，其所主辦的《現代評論》雜誌卻刊出了陳源（字西滢）的一篇文章，暗諷「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按：浙江籍，國文系〕的人」，⁵⁴ 「胡適派學人」因此被攪進了女師大風潮的混水，「西滢教授」等「正人君子」也從此成為後來掌握極大話語權的浙江留日學生、在多所大學講授中國文學的左派文人周樹人痛罵的對象，⁵⁵ 站到這一派「青年」（教員、學生）的對立面上了。

胡適與「某籍某系」中人或許有多年的宿怨，⁵⁶ 但魯迅成為話語權戰場上的霸主是多年後的事。⁵⁷ 是以，在分析女師大風潮上，更重要的可能是「法日派」與「英美派」的鬥爭。⁵⁸ 「法日派」以李石曾為代表，李石曾時任國民黨北方黨部的政治委員，雖然與左派政黨並無從屬關係，但陳獨秀仍以「國民黨左派」

⁵² 魏善玲，〈楊蔭榆與「女師大風潮」〉，《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2010年8月），頁79。

⁵³ 〈章士釗上段祺瑞呈〉（1925年8月12日），引自葛濤，〈章士釗在「女師大」風潮中的四則佚文〉，《博覽群書》，2009年第6期（2009年6月），頁112-113。

⁵⁴ 西滢，〈閑話〉（1925年5月30日），《現代評論》，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頁10。

⁵⁵ 參見魯迅，〈無花的薔薇〉，收入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3卷（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1939年），頁242-243。魯迅曾在其雜文中多次對胡適派學人冷嘲熱諷，此錄一部，餘不具引。

⁵⁶ 參見桑兵，〈馬裕藻與1934年北大國文系教授解聘風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2016年5月）。文中提及錢玄同、黃侃、馬裕藻和林損等浙江籍國文系學人與胡適的關係，並未提及魯迅，但從此時《現代評論》對其主動發起攻擊的情況來看，兩人之間的關係應當甚惡。

⁵⁷ 儘管此時的魯迅只要一提筆幾乎都有痛罵章士釗的內容，但綜覽章士釗所主辦的《甲寅周刊》，卻基本不提魯迅。與之相對，《甲寅周刊》幾乎每期都有攻訐胡適的內容。

⁵⁸ 見林輝鋒，〈五四運動後至北伐前夕的教育界風潮——以馬叙倫的經歷為視角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2010年1月）。

稱之，並且對其政治態度表示欣慰。⁵⁹「英美派」以胡適為領袖，在胡適眼裡，「法日派」除了意圖以易培基擠走楊蔭榆外，亦在北大「結黨把持，傾軋夢麟（按：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胡適因而在日記中痛感「我終不料他們會陰險下流到這步田地！」⁶⁰而李石曾等「法日派」在女師大碰壁之後，繼續利用其同時身兼北京大學教授的機會，策動「北大獨立事件」攻擊章士釗。1925年8月18日，「法日派」突然在北京大學評議會中提出脫離教育部獨立案，並且在7票同意、6票反對的情況下得到通過。在「英美派」眼中，此事「就校章言，此項議決既非評議會法定權限以內之事；就先例言，本校於彭允彝長部時期脫離教部，亦係經由教職員大會議決。貴會於本屆任內，兩次宣告與教部脫離關係，事前俱未徵求教職員同人之意見……要不免有越權自專，漠視全體教職員同人之嫌。」⁶¹胡適當時並未參與投票，事後曾就此事向代理校長蔣夢麟提出嚴重抗議；⁶²同時亦有公開信表明自己的立場，其主要主張有三：

- （一）本校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為國家留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
- （二）本校同人要做學校以外的活動的，應該各以個人的名義出去活動，不要牽動學校。
- （三）本校評議會今後應該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謀學校內部的改革，不當輕易干預其職權以外的事業。⁶³

其實這三項主張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學校不應與政治發生關係。胡適此說自與前述他主張教育界的當務之急，甚至唯一的任務是將學生「鑄成個有用的東西」的思想有關。至此，胡適依然沒有太過政治化的言論出現，即使他涉入了政治，若不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只從表面現象來看，我們很可能會以為上述事

⁵⁹ 陳獨秀，〈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1925年12月13日），《陳獨秀文集》，第3卷，頁338。

⁶⁰ 〈胡適日記〉，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0卷，1925年1月17日，頁190。

⁶¹ 相關報導與「英美派」的公開信，見〈北京大學宣告獨立〉，《晨報》，北京，1925年8月20日，版3。

⁶² 胡適，〈致蔣夢麟〉（1925年8月25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3卷，頁410-411。

⁶³ 胡適，〈致北大同事公函〉（1925年8月21日），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3卷，頁410。

件只是學校人事及政策方面的政治，並不是狹義的國家、黨派之間的政治。

二、兩極化世風下的胡適

然而，此時的這些學潮，在本質上就不只是教育界內部的問題，更是政治鬥爭的一環。當時有人觀察到，「此次章士釗登臺，如果沒有人利用學潮以鼓動政潮，頂著女師大為打倒章士釗的工具，則女師大的解散，無機暴〔按：爆〕發。所以女師大的風潮鬧到如此田地，學閥和利用學潮的名流委實不能辭咎。」⁶⁴而繼女師大風潮發生的北大獨立事件真實原因係「北大內部欲借女師大學潮為黨爭之具。」⁶⁵再之後的胡適離京也被認為是「據說與校中的國民黨系教授（李石曾、顧孟餘等）鬧意見，告了長假，在上海養病著書」云云。⁶⁶這些觀察者無論其政治立場是左是右，都將此時北京城內發生的事件歸因於「黨爭」和「政潮」，於是黨爭和政潮便很可能是能夠解答前述問題的關鍵。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以來，學生運動蓬勃發展，在政治場域中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正如國民黨二大〈青年運動報告決議案〉中所提到的，「青年具有勇敢犧牲的特性，實為國民革命的先鋒軍……一切民眾示威運動，多半在青年學生領導之下。」⁶⁷對於各方政治勢力而言，取得學生的支持，意味著在話語上取得了制高點；在文化領導權的戰場上取勝，意味著在政治、軍事場域中便取得「以有道伐無道」的大義名分，其影響力自不容低估。因此，為了更好地掌握學生，掌握學校的主導權對於各方政治勢力便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戰術目標。職是之故，女師大校長之爭不只是「某籍某系」教員擴展自己校內權力的手段，北大獨立事件亦不只是「法國文化派」與「非法國文化派」的鬥爭，更是李石曾等人「利用北大脫離教育部的舉動，帶動其他國立大學跟進，以教潮牽引政潮，進一

⁶⁴ 譚慕愚，〈關於北京教育界及女師大風潮的一封信〉，《醒獅》，第50期（1925年9月19日），版4。

⁶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341。

⁶⁶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頁15。

⁶⁷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4年），頁131。

步拖垮北京政府。」⁶⁸

論者的依據在於除了李石曾是此時國民黨北方黨務的高階負責人之一外，更因為國民黨才在不久之前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3次會議通過了一份決議，明確指出「要使學生在國民革命當中多盡一點責任，必須他們組織起來，所以我們要盡力去組織學生團體。」⁶⁹於是，「學生運動在校內享有教師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國、共兩黨的支持，因此勢力更見強大。此外還牽涉到其他的政治勢力。故而情形愈來愈複雜，聲勢也愈來愈浩大。」⁷⁰這股越來越浩大的勢力，甚至公開宣言：「我們要詳細說明國民黨、共產黨是真正能夠領導人民革命的政黨（廣東的事實擺在眼前）……以真正革命為本質而領導國民革命，以求中國國家之獨立而去救國救世的『黨』，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加入！？」⁷¹從中可見這些組織起來的學生已選擇站在廣市政權的一方。因此，1925年北京發生的諸多學潮，無論其為學生自發，或為政黨（或是具有黨派色彩的教員）所運動，其趨向都與廣市政權接近；也因此，無論譽之為學生自主的革命行動，或詆之為被政黨利用的無意識行動，都無法否認一個事實——此時的學生，與國民黨及共產黨站在了一個陣線上，成為戰略上的同路人。因此，正如梁啟超所觀察到的，「這回上海事件，純是共產黨預定計畫，頑固驕傲的英僑和英官吏湊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⁷²報端亦有「對英日示威運動，近漸有化為內爭之傾向是也。例如六月三十日之北京國民大會，其為廣東政府對北京政府、某黨對某系〔按：國民黨對研究系〕、某軍閥對某軍閥〔按：馮玉祥對張作霖〕之示威運動，甚明瞭也」之報導。⁷³

⁶⁸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239-240。

⁶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記錄」（1924年3月12日），《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會議錄》，第1冊，《會議記錄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檔號：會1.3/2.1。

⁷⁰ 蔣夢麟，《蔣夢麟自傳：西潮與新潮》（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頁186。

⁷¹ 蒼水，〈禁止學生加入政黨問題〉，《中國青年》，第104期（1925年12月），無頁碼。

⁷² 丁文江等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675。

⁷³ 〈勿忘國民代表會議〉，《順天時報》，北京，1925年7月5日，版2。

這種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夠被運動起來，是因為參與者之間形成了一種以共同理想、共同敵人為核心的集體認同。⁷⁴ 如果說各種共同體都有「想像」的成分在內，那麼為了凝聚此一集體而劃定的邊界也不見得與事實相符——比起明確辨別他者的派別，直接將之全部打為「非我族類」自是方便許多。因此，胡適的學生運動論，與章士釗的在表面上看來極為相像，而反對「法日派」「奪權」的行動更是在客觀上與章士釗站在同一陣線；在帝國主義問題上，胡適傾向的修約外交理念也與北京政府接近而與廣州政權、國共兩黨截然相反。在這種情況下，此時參加示威的「青年」們很容易產生胡、章沆瀣一氣之感，於是左翼知識分子——姑不論他們是否認識到胡、章其實並不同派——便據此展開了對胡適的批判，稱其為「死狗」、「為卑劣的章士釗張目」云云。⁷⁵ 同樣此時正藉由五卅慘案及其後續交涉而在輿論戰場上對北京政府主動發起攻擊的廣州政權，⁷⁶ 也因此開始批判胡適陰謀「渙散國人對外之氣，故使英人知我怯懦，使賣國政府有所藉口而讓步」，⁷⁷ 並將胡適放在當時盛傳「英政府已與日美分頭交換意見，應付東方問題。滬案在其次，對俄斷交問題在前。英將以長江因襲勢力交托美國，以黃河因襲勢力交托日本，俾本國專與蘇聯周旋，並唱英美日三國排斥共產主義大聯盟」、⁷⁸ 英人盛贊張作霖「為反對共產主義之絕好軍人」⁷⁹ 的語境之中，樹立了英美日／北洋系軍人與蘇聯／廣州政權的兩極對立話語。

至此，思想的分歧正式成為政治上的敵對關係。

⁷⁴ 參見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

⁷⁵ 求實，〈評胡適之的「新花樣」〉，《中國青年》，第4卷第98期（1925年10月），無頁碼。

⁷⁶ 參見陳廷湘、王珍富，〈國內政治對立與國權索回之爭——「五卅」慘案發生後「修約」「廢約」主張新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10期（2011年10月）。

⁷⁷ 楚女，〈反抗五卅慘殺運動中所見的階級鬥爭〉，《中國青年》，第4卷第86號（1925年8月），頁3。

⁷⁸ 〈國內專電〉，《申報》，上海，1925年7月14日，版5。

⁷⁹ 〈港報論張作霖〉，《順天時報》，北京，1925年7月11日，版2。

肆、思想、政治與現實局勢的糾纏

將胡適與章士釗或張作霖連結，雖然不見得符合事實，但卻是反對胡適者的一種重要的宣傳手段。根據前節所述，在政治爭論中，人們使用了兩極對立、非黑即白的話語，故而讀者已難以分辨這些反對者的主要目標究竟是段祺瑞、章士釗或是胡適。但無論其本意如何，胡適在這一時期受到衝擊致使其從「百尺竿頭掉下來」亦是事實，因此這裡不談段祺瑞，只圍繞胡適問題，分析攻擊者一側的情況究竟是怎麼樣的？他們攻擊胡適有什麼考量？他們的攻擊為什麼能夠獲得時人的同情？

一、話語權爭奪的政黨因素

在充滿各種示威遊行的1925年中，北京城內有一位警察將一切歸因於「學生和國民黨搗亂的原故」。⁸⁰ 這裡說的國民黨，雖然肯定包含被陳獨秀視為「國民黨左派」的該黨北京黨務負責人丁惟汾、李石曾等人，但也包含當時正在進行國共合作的共產黨。⁸¹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初、當孫文著手改組國民黨之時，便曾經指出：「黨的進行，當以宣傳為重……宣傳的效力，大抵比軍隊還大。」⁸² 孫文所強調的宣傳，當然是指對全國各界的宣傳，而由於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成為政治運動的先鋒力量，是以對學界的宣傳當是重中之重。然而，如果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看當時的北京學界，特別是領頭的北京大學，不但不是國民黨的勢力

⁸⁰ 為人，〈北京學生〉，《政治生活》，第40期（1925年5月24日），頁4。

⁸¹ 對於當時的許多時人而言，甚至到1927年清共以後，依然難以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加以劃分。如王季烈在1930年曾經大罵蔣介石為「勞農黨」（見王季烈：《誠子篇》，《螭廬未定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頁136），因為在他們看來，當時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並無本質的區別，都是主張社會革命、破除三綱五常的政治組織（參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頁309-320）。雖然一個普通警察的政治態度可能不會如同前清遺老那般激烈，但在1925年國共合作尚未破裂的當下，他也很可能無法區分兩黨的異同，而一概稱之為「國民黨」。

⁸² 孫文，〈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的演說〉（1923年1月2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6。

範圍，其核心人物蔡元培、胡適等甚至與吳佩孚、段祺瑞等軍人或與研究系等政治團體有過合作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除了痛罵蔡元培「私心太重，欲駕中山先生而上之，祇顧經營自己事情，而忘本黨主義及開國元勳之孫先生〔按：蔡氏年來欲偕學生推倒軍閥，以總統自代〕。」⁸³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除了「私心太重」的北京大學，由於梁啟超等人的長期經營，當時人普遍覺得教育界是研究系的「固有地盤」，⁸⁴這更加顯示了國民黨在1920年代初期話語權戰場上的困境。

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情況，國民黨首先利用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的政治氣氛較為緩和的時候，在北京展開活動。除了密由楊度在北京「略有布置」、「尤注意於教育界」⁸⁵之外，據當時被發展入黨的謝體先回憶：「1923至1924年，謝先生〔按：謝持〕奉孫先生之命北上，發展學生入國民黨，王昆侖、傅汝林、鄒德高、我，好幾十個人。……由陳銘德在法政學堂發展多人，在學校成立組織，辦《民生周刊》宣傳三民主義」⁸⁶等等，逐步在學校內部建立起黨組織。這樣的工作不只在北平進行，在一直為直系實力派所控制的江蘇亦有類似的布置。在國民黨與段祺瑞臨時執政府正式決裂前夜發生的東南大學易長風潮，便是一項集中的體現。據曾參與其事的東南大學學生羅時實晚年回憶，當時的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政治主張平素接近研究系」，因此「從國民黨看，這些年來東南大學，直是在他們〔按：研究系〕勢力範圍。這是長江流域的最高學府，國民黨一時既乏實力取得政權，先從掌握青年思想的心戰入手，要求更換東大校長可能是當時一大戰略。」⁸⁷同理，更換女師大校長、策動北大脫離教育部，亦可以是國民黨的戰略之一。

在這麼一個爭奪話語權勢的戰場之中，由於胡適是「文學革命的巨子，負

⁸³ 「蒲名元致彭素民函」（1923年5月21日），《環龍路檔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環9154。

⁸⁴ 見〈各政黨希圖報復之新結合〉，《益世報》，天津，1922年8月15日，版6。

⁸⁵ 〈楊度上總理函〉（1922年9月6日），《環龍路檔案》，檔號：環13983。

⁸⁶ 謝體先，〈謝持先生年譜資料·陳銘德訪問錄〉，收入《謝持日記未刊稿》，第6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469。

⁸⁷ 羅時實，〈成賢街回憶（二）：十四年東大學潮與我〉，《傳記文學》，第1卷第5期（1962年10月），頁29。

一時盛望……受過我們青年的崇拜」，所以國民黨一直「對他的言論常很注意。」⁸⁸ 然而，胡適在政治上似乎與國民黨並不在同一陣線上，在胡適與直系合作期間，由其所主導、由蔡元培領銜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時任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在該黨機關報《民國日報》連日的攻詰，並且引來陳獨秀等左派人士在〈對時局的主張〉的逐條駁斥。後來胡適參加善後會議，雖然只是「為了一個主張而來」、並且做到了「為了主張的失敗而去」，但仍不能諱言此時的胡適依然認為北京政府才是貫徹其「實驗」的對象。除此之外，胡適與國民黨的老對手——前身是保皇會、進步黨的憲法研究會的領袖人物——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從五四運動以來一直有著一定的交誼及政治上的合作。⁸⁹ 到了1925年，胡適仍常與梁啟超吟詩作對、⁹⁰ 並與林長民等人有著組織「中華聯邦黨」的計畫，⁹¹ 足見雙方關係之密切。雖然胡適對北洋系政權或梁啟超等人的接近不代表他支持段祺瑞而反對廣市政權，⁹² 當年他在決定參與「好人政府」或善後會議時甚至可能並未將國民黨的感受列為權衡的因素，但這些行為，無論是有意或無意，在有心人眼中，都是政治上的「站隊」行為。若真要上綱上線，自然也很容易會被說成是與包含共產黨在內的國民黨勢力在政治上立於敵對的位置。正因為這樣的歷史及人際關係，國、共兩黨中人對於胡適一直存在著心結。國、共中人一直對當年

⁸⁸ 關中哲，〈胡適又要嘗試〉，《民國日報》，上海，1925年1月29日，「覺悟」頁2。

⁸⁹ 參見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2018年9月）。雖然雙方曾發生「科玄論戰」，梁啟超的「護法」張君勱（吳稚暉語）受到包括胡適及陳獨秀在內的《新青年》群體（無分左右）的圍剿，但雙方關係並未受到影響。

⁹⁰ 見湯志鈞等編，《梁啟超全集》，第19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69-78。

⁹¹ 見《胡適日記》，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0卷，1925年1月18日，頁190。所謂「中華聯邦黨」，一望可知是支持聯省自治的政黨。胡適在1922年便曾多次在《努力周報》上撰文支持聯省自治，即將召開的善後會議中，聯省自治亦是一項重要的議題，故雖然最後未聞此黨成立之耗，但亦可以推測此時聯治派希望能夠儘量聚集同志以影響其時的憲制走向。胡適即使未直接參與，至少也持著樂觀其成的態度。

⁹² 更何況此時孫文、段祺瑞及張作霖的三角同盟關係尚未破裂（廣州與北京的決裂遲至是年5月份才發生）；孫文對善後會議雖有不滿，但其隻身入京，表明了他還是對段祺瑞政權有所期望。又，有論者認為此時的胡適雖然對依附在國民黨內部的共產黨十分不滿，但整體而言依然心向國民黨、反對北京政府（參見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頁36-38）但是，即使此時的胡適真的心向國民黨，國民黨黨組織的政治機器是否「領情」則是另一問題。

「陳炯明受英人利用」時，「胡適之便進一步獎勵他是『革命行為』」⁹³ 感到耿耿於懷，故而到了胡適正式通電參加國民黨所反對的善後會議之後，國民黨的宣傳機器便開始批判「主張好人政治的胡適之，卻願意做軍閥之裝飾品，而以『試他一試』自解……自吹十年以內，不發生政治關係之胡適，一聞相聘，即致書權貴，願意試他一試。所謂領袖群英之人物，一小小委員，即呼之便來，可謂斯文掃地。」⁹⁴

二、話語權爭奪戰中的胡適

回到1925年，在東南大學風潮中，研究系自不消說，趨新的胡適，及守舊的章士釗都站在郭秉文一邊、反對由胡敦復接掌校長，這樣一來他們自然站到國民黨爭奪文化領導權戰略的對立面上去了。⁹⁵

在國民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戰場之上，具有一定權威意義的胡適竟然立於其反對之一側，故而必然會向他發起集中的攻擊。基於這種「戰略考量」，再加上前述胡適的「反動」歷史，於是「青年」們很容易地便將胡適與梁啟超、章士釗打為一丘之貉，故在北京大學一院的廁所裡，就有人在牆面上寫下了上述三人為「拜把兄弟」且認段祺瑞為父、袁世凱為祖父、溥儀為曾祖的塗鴉。⁹⁶類似的連結方式亦非僅見於此，例如國民黨大老吳稚暉曾經鼓動楊鴻烈以「勸梁任公、張君勱、胡適之三先生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書」為題對胡適提出「勸告」；⁹⁷北京的左派報刊亦稱「雖然他們〔按：胡適、陳源〕不是研究系，但是對於歷來詆毀國內的新興勢力——工農的發展——厚誣中山先生，痛詆國民黨，造謠生事的《晨報》結不解之緣」。⁹⁸同時，上海學生總會亦曾發布通電，指胡適「倒行逆施，

⁹³ 瞿秋白，〈反帝國主義運動與中國國民黨〉（1924年9月20日），收入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瞿秋白文集》，政理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629。

⁹⁴ 春濤，〈原來是這樣嘗試〉，《民國日報》，上海，1925年2月1日，「評論之評論」，頁4。

⁹⁵ 關於東南大學易長風潮，可參見李娟，〈黨化教育、大學自治與人事糾葛——1925年東南大學易長風潮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⁹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315。

⁹⁷ 見楊鴻烈，〈勸梁啟超張君勱胡適之三先生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書〉，《京報》，北京，1925年2月4日，副刊版1。

⁹⁸ 東籬，〈談「是非」質現代評論〉，《政治生活》，第51期（1925年9月16日），頁5。

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之章賊士釗合作……長此以往，先生將永為吾全國青年所深惡痛絕。」⁹⁹ 梁啟超姑不論，真要說胡適與章士釗（此時的兩人正分別以《現代評論》與《甲寅周刊》為陣地互相攻詰）是同一派的，恐怕沒有人會真的相信，但「青年」們卻做出了這樣的指認，其意義並非在於它是否符合事實，而是在於這等於從政治上宣告胡適就此成為「青年」的敵人，是應該要打倒的對象。

在一片罵聲中，胡適離京，但反胡者仍不願意放過胡適。恰逢此時吳佩孚在武漢重振旗鼓，號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於是這些「青年」們又想起當年胡適與直系的合作關係，故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主辦的《中國青年》周刊上出現了一篇文章，稱：「現在北京各校都開學了，學生都上課了，他的目的是達到了。但是他卻在這吳佩孚『東山再起』，內戰將作時候，從〔北〕大請假，跑到武漢，現又邀游滬濱。在一九二二年吳佩孚勢力全盛時代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現在如此熱心旅行，是何意義？明眼人自能知曉。」¹⁰⁰ 其話外之音已不需再作解釋。雖然《中國青年》的這種暗示並非事實，但在話語權勢的戰場上，事實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相信或假裝相信，並以之進行攻詰。此後，胡適在南方遭遇了如影隨形的一連串抗議活動，據胡適自己所述，「我這回來，挨了不少的罵」，罵他的都是一些「共產派的學生」／陳獨秀的「同黨少年」。對於這些「謾罵」，胡適自是十分惱火，有些信件甚至「看了就撕了」，足見他所受到的攻擊如是熾烈，已到了足以使他無法保持冷靜的程度。¹⁰¹

當胡適因為政治立場歧異而遭受「青年」們的攻擊的時候，曾經想要寫給陳獨秀一封信，抱怨「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國中。……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個人這幾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擊和污衊。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眼界。」¹⁰² 由於這封信

⁹⁹ 「上海學生聯合會致胡適公函」（1925年8月22日），《胡適檔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檔案館藏，檔號：2104-003。

¹⁰⁰ 靜，〈胡適搞的什麼鬼〉，《中國青年》，第5卷第102期（1925年11月），無頁碼。

¹⁰¹ 胡適，〈南行日記〉，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0卷，頁202。

¹⁰² 胡適，〈致陳獨秀（稿）〉（1925年12月間），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3卷，頁415-416。

是否曾經寄出都仍是疑問，故我們今日已經無法得知當時的陳獨秀本人對於胡適是什麼樣的態度。但無論如何，胡適已經成為這一派「青年」的敵人，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另一方面，胡適與陳獨秀的友誼似乎未受到「同黨少年」的影響，當胡適南遊到了上海之後，陳獨秀「聽見適之兄到了，非常高興歡喜」，而胡適亦與陳有過多次會談。¹⁰³ 有些學者從胡、陳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為即使是在兩人因帝國主義問題大吵一架之後，陳獨秀依然認為胡適是「我們」、是需要爭取的對象。¹⁰⁴ 但是比陳獨秀更年輕的「青年」們是否依然還是這麼想呢？早在1921年，比陳獨秀小十三歲的郭沫若在成立「創造社」時便曾聲言：「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我國新文藝由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致文藝之新興氣運，漸滅將盡。」¹⁰⁵ 這段話雖未指名道姓，但所謂「一、二偶像」指的當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與陳獨秀。雖然郭沫若不以陳獨秀為然，但我們亦無法否認他也是一名左派知識分子。之後，在1925年的風潮中對胡適批判最烈且能考證出其人其事的，亦是小陳獨秀十二歲的蕭楚女、相差十六歲的惲代英等人，足見《新青年》群體分裂出來的左派知識分子，在發展的同時，也在內部產生了世代差異。至此，即使陳獨秀仍希望能讓胡適重新成為「我們」的一員，已是勢有不能。

三、話語權爭奪的勝敗因素

過往許多學者，如李澤厚等，在評論20世紀的中國歷史時，對於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主張在言論市場上讓位於種種以「革命」為名的政治實踐，作出了「救亡壓倒了啟蒙」的總結。雖然學者也指出啟蒙與救亡在最初是互為表裡的兩項因素，但由於國難過於緊迫，因之比起強調個性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們開始傾向於其他以集體為依歸的思想，歷史於是走上了令其感到相當遺憾的方

¹⁰³ 見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頁96-97。

¹⁰⁴ 參見羅志田，〈北伐前數年胡適與中共的關係〉，《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2003年7月），頁3、48-49。

¹⁰⁵ 饒鴻競編，《創造社資料》，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64。

向。¹⁰⁶ 這樣的說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失之片面。所謂片面之處，在於李澤厚預設了只有自由主義的價值才是「啟蒙」的價值，而忽略了其最終目的仍是「救亡」，同時也忽略了那些「壓倒了啟蒙」在他看來具有政治及集體主義色彩的「救亡」思想的起點處也是「啟蒙」。

晚清以來，作為一個概念的「主義」，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在1920年左右漸漸形成一種以「社會」為對象、對未來有著烏托邦式想像，並且以組織的行動企圖改造「社會」、建成理想國的行為結構。這種思維模式的成因，與現實的千頭萬緒、極度黑暗有關，例如原本是胡適忠實信徒的毛澤東，因為在開列「問題單」時發現無法窮舉，於是「逐漸轉向整體的解決，宣稱：『社會萬惡』以及要『創造一種新社會』」，形成了一種「主義」式的方針。而「主義標示著統一的意志、集體的追求、動員各階層，希望深入各階層。此時『學理』的吸引力已經讓位給主義，尤其當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文藝的關心，讓位給政治的關心之後『主義』——信仰化的主義，在政治論述的市場中成為強勢貨幣。」¹⁰⁷ 在這種情況下，以一句簡單的「打倒帝國主義」為號召的陳獨秀等人的言論，自然比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大總統的權限」……等等看似瑣碎問題的胡適的作法，更符合時代的潮流，也更能吸引到亟欲改造此「萬惡的社會」的熱血青年的目光。

但是，形式上符合潮流的思想固然能夠在第一時間抓住人們的眼球，但如果這套思想所指引的路徑在實踐上對現實問題沒有幫助——正如民初的代議制實驗一般——那麼人們還是會轉而尋求其他的思想。當在善後會議上胡適「試他一試」的主張隨著他的退出而宣告失敗後，胡適（及段祺瑞執政府）在話語場域中的補救機會便只剩下五卅慘案後的對外交涉。然而，在這場交涉中，中國方面的主張基本上

¹⁰⁶ 參見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頁7-49。

¹⁰⁷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40、57。

未能實現，談判期間又發生沙基慘案等事件，無一不加深民眾對於北京政府及「沒有帝國主義」論的不信任感；此後的關稅特別會議及法權會議皆不了了之，更是刺激了輿論向廣州政權所主張的「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一方傾斜。如此種種，促成了人們對北京政府的反對及示威，正如蔡和森對北京城內某一次示威活動所下的評語：「我們只要回想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國民會議運動如何被段政府所破壞，金佛〔郎〕案如何解決，輿論如何被摧殘，各種集會如何被解散等事實，我們便可了解此次北京學生群眾的舉動決不是偶然的。」¹⁰⁸ 同理，人們轉向革命的「主義」，而拋棄改良的「問題」，也不是偶然的。

此外，雖然胡適對於段祺瑞的態度是「試他一試」，但因為表面上的相似性，使得人們很容易認為他與段祺瑞等北洋系軍人沆瀣一氣，人們對北洋系軍人的觀感也因此或多或少溢出到胡適及其主張之上。誠如學者的研究，「1920年代初的各次民意調查，軍閥尚能得到 29.20%的選票，但是到1926年《京報副刊》舉行民意調查時，軍閥在最高層級的『新中國柱石十人』投票及政治類柱石人物投票中全面敗北，僅僅得到若干軍事類柱石人物投票，而國民黨得票則大幅上升。」其原因固然有軍閥的「失政」，但國、共兩黨的宣傳亦是重要因素；正是宣傳工作的成功，使得「普通百姓對軍閥政府的『最後一點敬意』也消失殆盡。」¹⁰⁹

至此，胡適與陳獨秀等左翼人士思想的分歧因為現實局勢的演變而在言論市場上出現了高下之分。然而，因思想分歧而發生的政治對立，卻因為現實局勢的發展及「主義」一詞所包含的排他性而落實為具體的對個別人物的攻擊。最終，「『主義』成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包辦一切真理、包辦一切是非的新東西時，1895年以來思想轉型的多元競逐之局於焉結束。」¹¹⁰

¹⁰⁸ 蔡和森，〈五七紀念北京學生奮鬥的意義〉（1925年5月），《蔡和森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405。

¹⁰⁹ 楊天宏，〈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基於北洋時期民意調查的分析與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2018年9月），頁58、62。

¹¹⁰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頁76。

伍、結語

固然，1925年的「批胡反胡」，有些原因是胡適本人的思想及言行所直接導致的，例如胡適與北洋系軍人之間的關係或是他在五卅慘案之後說的「不時髦」的話，這些行動都能從胡適一貫的思想中自然而然推導出來的結論。本來，言者無罪，但是當時的那個時代，學風、世風已經趨於政治化、極端化，於是胡適（或其他人）無論有何言行，只要表現出來，都具有高度的被攻擊的風險。胡適被批的風險之所以最終「兌現」了，則是因為他捲入了國、共兩黨對話語權勢的爭奪戰之中，也是因為他的言論並不為當時人所接受。固然，胡適如何思想、如何表達，都是他自己的事，後世論者大可稱讚其堅持「純粹自我」，「以思想上的個人主義之名而公然反對服從一致的要求」的舉措。¹¹¹但他既然如此思想、如此表達，那麼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則成了他的時代命運。雖然有人認為胡適「青年導師」的地位從未因為1925年的這些事件而失墜，其證據是直到1950年代甚至現代，中國國內信仰「西歐理想」者依然以胡適為宗師，¹¹²信仰「東歐理想」者依然以胡適為首要敵人；但如果將「失墜」一詞當成相對性用語，1925年以後的胡適，相對於1919年之時的胡適，作為「導師」，所能號召的「學生」已經大幅地減少，從而使得時人對胡適有「百尺竿頭掉下來」之譏。¹¹³

儘管胡適在1925年中屢屢呼籲學生們不要涉入政治、應埋頭作學問，但在國民革命的浪潮之下，又有誰能自外其間呢？或許，「學術救國」才是長遠之計，

¹¹¹ 賈祖麟，《胡適之評傳》，頁186。

¹¹² 有意思的是，當年與共產黨密切合作、後來標榜「反共」的國民黨在其官方編纂的「臺灣先賢先烈專輯」裡的《胡適傳》中，提了1951年的「清算胡適思想運動」，卻對於1925年的事情隻字不提，只提那年胡適與章士釗為了白話文問題而打筆仗之事。參見咸宜君，《胡適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92-93、122。

¹¹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301。當然，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胡適本人「導師」的地位如何倒是其次，對後來歷史影響最大的，應是其所嚮往的「西歐理想」／自由主義價值的失墜。——當然，其墜勢早已發生，甚至它是否真正存在於中國過都是一個問題。但許多論者仍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建構出了一個具象徵意義的「胡適」。這是題外話。

但別說青年，就連胡適自己亦無法對「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視若無睹，可卻因為思想與對政治看法的差異，使得他被捲入1925年的政治漩渦之中，遭受了大量扣帽式的攻擊。在1925這一年，左派「青年」所點燃的星星之火摧毀了章士釗的私宅、焚燒了梁啟超的報館。胡適因而感慨當時「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¹¹⁴ 但是無論點燃這把名為「不容忍」之火的是誰，這把火就在這一年開始延燒，思想上的分裂逐漸走向「政治解決」的道路。國民政府時期，當胡適擔任政府的「諍友」之時，在1925年曾經攻擊過他的部分左翼人士是被壓制甚至被「解決」的對象；1949年之後，情況則正好相反過來。這長達數十年的鬥爭之後，曾經幾度因政治情勢而出現了一群勝利者，但在「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情況下，只能不斷重覆「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的輪迴。這或許就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自己播下、自己收割的時代命運了吧！

¹¹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頁381。有趣的是，在另一批人眼中，平素主張容忍的胡適其實一點也不容忍，常透過種種言論或手段「強令天下之學者默焉以屈於己。」參見孤桐（章士釗），〈疏解輶義〉，《甲寅周刊》，第1卷第11號（1925年9月26日），頁6。

徵引書目

一、檔案

《胡適檔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檔案館藏）

〈上海學生聯合會致胡適公函〉。

《會議記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會議錄〉。

《環龍路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蒲名元致彭素民函〉。

〈楊度上總理函〉。

二、史料彙編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4年。

饒鴻競編，《創造社資料》，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三、日記、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

王季烈，《螭廬未定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李大釗著，朱文通等編，《李大釗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周振甫注，《魯迅詩歌注》。杭州：杭州人民出版社，1962年。
-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張彭春，《張彭春清華日記（1925）》。臺北：開源書局，2020年。
- 陳獨秀，《陳獨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
-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 蔣夢麟，《蔣夢麟自傳：西潮與新潮》。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
-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不詳〕：魯迅全集出版社，1939年。
- 謝持，《謝持日記未刊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
- 瞿秋白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

四、雜誌、報紙

- 《大公報》，天津，1925年。
- 《中國青年》，上海，1925年。
- 《民國日報》，上海，1925年。
- 《甲寅周刊》，北京，1925年。
- 《申報》，上海，1925年。
- 《京報》，北京，1925年。
- 《益世報》，天津，1922-1925年。
- 《晨報》，北京，1923-1925年。
- 《現代評論》，北京，1925-1926年。
- 《順天時報》，北京，1922-1925年。
- 《醒獅》，上海，1925年。

五、專書

- 白吉庵，《胡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朱文華，《胡適評傳》。青島：青島出版社，2007年。
-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
-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 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北京：學林出版社，2006年。
-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年。
- 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
- 邵建，《胡適前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年。
-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耿雲志，《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課題組編，《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 戚宜君，《胡適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 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
- 賈祖麟著，張振玉譯，《胡適之評傳》。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
-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六、期刊論文

- 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
- 林輝鋒，〈五四運動後至北伐前夕的教育界風潮——以馬叙倫的經歷為視角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2010年1月）。
- 桑兵，〈馬裕藻與1934年北大國文系教授解聘風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2016年5月）。

- 耿雲志，〈《新青年》同人分裂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細節〉，《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2018年9月）。
- 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2018年9月）。
- 陳廷湘、王珍富，〈國內政治對立與國權索回之爭——「五卅」慘案發生後「修約」「廢約」主張新論〉，《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0期（2011年10月）。
- 楊天宏，〈軍閥形象與軍閥政治癥結——基於北洋時期民意調查的分析與思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2018年9月）。
- 葛濤，〈章士釗在「女師大」風潮中的四則佚文〉，《博覽群書》，2009年第6期（2009年6月）。
- 潘光哲，〈怎樣歡迎「賽先生」：胡適與巴斯德〉，《思想史》，第6期（2016年3月）。
- 魏善玲，〈楊蔭榆與「女師大風潮」〉，《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2010年8月）。
- 羅志田，〈北伐前數年胡適與中共的關係〉，《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2003年9月）。
- 羅時實，〈成賢街回憶二：十四年東大學潮與我〉，《傳記文學》，第1卷第5期（1962年10月）。

七、學位論文

- 李娟，〈黨化教育、大學自治與人事糾葛——1925年東南大學易長風潮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 汪文麗，〈胡適與1925年的青年「批胡反胡」事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

